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创新

主编 傅修延

刘松来◎著



井蛙睥语

——儒道禅与中国古代文学

“井蛙”者，乃“坎井之蛙”省称也，语出《庄子·秋水》。所谓“睥语”，即周岁孩童的咿呀学语。孩童之言虽失之稚嫩，但所贵在纯真。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NGWA ZUIYU
RUDAOCHAN YU ZHONGGUO GUDAI WENXUE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创新
主编 傅修延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刘松来 ©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井蛙啐语

——儒道禅与中国古代文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蛙啐语——儒道禅与中国古代文学/刘松来著. —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7.12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创新/傅修延
主编)

ISBN 978 - 7 - 81132 - 146 - 3

I . 井… II . 刘… III . 宗教 - 关系 - 古典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194061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电 话	(0791)8529392,8504319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南昌市印刷五厂
照 排	南昌市印刷五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50.375
字 数	12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2 - 146 - 3
定 价	12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刘世南

松来准备出版一本古典文学论文集，嘱我作序。这时正在丁亥年春节前夕。我很高兴，自2007年2月9日（旧历十二月廿二日）起，每天看几篇，直到2月22日（旧历正月初五日）看完，共花了14天。只有很少时间在家里看，多半是背一个旅行袋，放几篇论文，或往绳金塔，或往滕王阁，时而象湖公园，时而人民公园。宋人费昶《梁溪漫志》记苏轼：“自涌金门从一二老兵，泛舟绝湖而来，饭于普安院，徜徉灵隐、天竺间，以吏牒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谈笑而办。”东坡居士真是名士风流，劳形的案牒他都能在山水间办理。我却不是附庸风雅，而是松来的论文正适合在名园胜地去吟赏玩味。“时下有一种论文，往往语言无味，而又故作高深，驯致冗长繁复，枯燥沉闷，读之觉‘肺气肿’而‘肠梗阻’！李泽厚先生谓为‘教授话语的通货膨胀’，语虽幽默，并未夸张。龚定庵诗云‘俭腹高谈我用忧’，亦是此意”（王翼奇《绿痕庐诗话》）。松来虽是教授，所作却与此种论文相反，我虽今年虚岁已称八十四，一贯手不释卷，却每读其论文一篇，必受启发，必有心得，因而一边游山玩水，欣赏古迹，一边“奇文共欣赏”，自觉乐此不疲。

清代大学者戴震曾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与是仲明论学书》）

松来此书论析的是古典文学，它贯通儒道禅三家，可谓淹博



矣！但是，正如陈垣序《余嘉锡论学杂著》所说：“汗牛充栋的书，既要多读善记，又要懂得读书的门径，如果不知门径乱读，或读过便忘，虽博何用！季豫（余嘉锡之字）先生能博学约取，这是他成功的一个方面。”这也可以移赠松来。松来对儒道禅并非泛滥无归，而是紧扣着中国古典文学这一中心。尤其是“道”，他所研习的是老、庄，而非道教；禅则是中国士大夫的佛学，而非佛教；就是“儒”，也不是要穷究汉、唐人注疏和《皇清经解》正、续编，只是取其有关于古典文学的而已。

识断是难。蒋士铨赠袁枚诗有云：“公所读书人亦读，不如公处只聪明。”聪明何物？就是识力，亦即识断。有的人读了很多书，甚至过目不忘，然而只成了“两脚书橱”，并无造就。这就是因为他“学而不思则罔”。“罔”者，自己不思考，被人牵着鼻子走，上当受骗也。松来不是这样，他在读研究生时，我讲了《庄子》内七篇，布置他写一篇小论文，结果他交了一篇《庄子形象系列之我见》来。我看了之后，批道：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劝他投《文学遗产》。果然，1987年第2期的《文学遗产》一字不易地全文刊发出来了。现在，读者可以细读一下这篇文章，看它是如何古今中外、四通八达、说理圆融、题无剩义的。可见“聪明”并不神秘，只是读书多，积理富，浚发心灵，于是别有会心，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而言人之所不能言。

精审，是最高要求。识断作为一种判断，是结论，但是否可以推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惑呢？历史上能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而不被淘汰净尽的科学结论有多少？然而就我浅见所及，松来这本论文集的所有结论，要推倒它们，以我管见，未必可能。

试从儒、道、禅各举数例以概其余。

在儒学与中国古典文学文面，松来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对《诗经》中某些较为复杂的篇章解说不一，原因之一就在于对情感表



现中的意念因素关注不够。从而分析出意念展示与情感表现之间存在三种关系:一是意念展示造成了情感性的时空关系,二是意念展示为诗人选择最佳契机抒情提供了便利,三是意念展示造成的幻象有利于抒发深层情感。

对《礼记·乐记》,则深入剖析“情本说”和“物感论”的产生机理、哲学依据,以及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且提出“淫乐”、“和乐”以及“惟君子为能知乐”这组概念代表孔子之后儒家艺术鉴赏理论的最新发展。

对《史记》“互见法”的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透彻地说明了这一方法不但是纪传体这种史学体裁得以成立的一个内在原因,而且是作为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史传文学作品不同于小说一类文学作品的根本区别。

最使我叹赏的是《〈牡丹亭〉“至情”主题的历史文化渊源》这篇,它不但揭示出“至情”主题是汤显祖至真至美至善哲学理想的艺术象征,是具“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的哲学理念的文学表达,而且启发我联想到清初朱彝尊的《高阳台》词写吴江县同里镇少女的单恋情死,清中期郭麐的《红桥曲》写扬州名妓与情人的泪史,绝似茶花女玛格丽特之于亚猛,清晚期的龚自珍的《瑶台第一层》词写某贵家女与某王孙的双殉故事,酷似《红楼梦》的宝、黛。以上三则故事不都可以归纳到《牡丹亭》的“至情”系列吗?

在道学与古代文学方面,论《庄》《韩》的文学异同,十分精彩:两者貌同的文艺观,源于迥异的逻辑起点;由此导致两者文艺观内在本质差异;“传神”与“写形”的不同特征构成了《庄》《韩》文学创作主体的主要倾向;“意象”与“形象”的不同内涵构成了《庄》《韩》文学的客体差异。

对我国古代艺术领域的直觉思维理论的溯源,对《淮南子》文艺鉴赏论对先秦诸子相关理论的突破和发展,都作出了确凿可信的论证。与张世英先生商榷一文,析理入微,能整体把握庄子与尼



采的学说，而不拘泥于字面。要求进行中西比较研究者必须整体把握研究对象，这是至理名言。

在禅学与古典文学方面，如禅学对江西宋代诗歌繁荣的影响，表现为闲散淡泊的超然心态，平淡简放的艺术风格，审美意象的哲理化。

禅宗不但对江西宋诗作者的审美意趣予以深刻濡染，而且在创作方法上也使之禅学化。松来以黄庭坚、杨万里这两位宋代江西籍大诗人为例，分析他们所标举的创作方法中的禅学影响。

以上所举各例，可以看出，凡所论断，皆极精审。这不是偶然的，完全是松来“好为深沉之思”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苏格拉底。据柏拉图《会饮篇》记载，苏格拉底有一天从清晨起思考问题，一直到中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天黑，有几个爱奥尼亚人好奇，搬铺盖来露宿，看他会不会站一整夜。结果他直站到次日清晨，向太阳做了祈祷才走。当然，松来只是在精神上与苏格拉底有些许类似而已，他并不会近于痴迷。

我在拙著《在学术殿堂外》一书中，特别强调治学重在打根底。这点，我一直坚信不疑。《礼记·礼器》：“无本不立。”《孟子·离娄》：“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韩愈《答尉迟生书》：“本深者叶茂。”《答李翊书》：“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海明威也说过：浮出海面的晶莹冰峰看来所以庄严，是因为水下有更庞大、更厚重的存在在支撑它。中外哲人这些格言无非说明为学重在打根底。

我不强调天才、悟性、才气等等。它们是存在的，也是从事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但是，水到渠成，根底扎实了，悟性自然生。你看，松来在每篇论文中，上下议论，无施不可，正如程金凤题龚自珍《己亥杂诗》后所说：“至于变化从心，倏忽万匠，光景在目，欲捉已逝，无所不有，所过如扫，物之至也无方，而与之之为无方，此其妙明在心，世乌从知之？”这是悟性，这是才气，然而这仍是学与思结



合的产物，并无他谬巧。

戴震曾说：“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他是以教下棋为比喻。治学也一样，一流学者不是教出来的。二、三流学者教给一流学者的是治学方法，孟子说得好：“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尽心》下）而一流学者之所以能成为一流，关键在于“巧”，即使是一流学者也无法把“巧”教给门徒的。俗话说得对：“师父带进门，修行在各人。”松来能有大成，完全是他好学深思的结果，我虽曾有一日之长，不敢居功，只引以为荣而已。不过，在此愿更为松来、尹雪华、周兴泰及乐顿益诸君进一言：李泽厚提过“思想淡出，学问突显”的话，王元化不同意。王氏门人胡晓明在《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中说过：“其学问生命与时代痛痒相关，其思也深，其言也切，这正是一般书斋学者所未能企及的。”我希望诸君永远做有思想的学者，而不要做书斋学者。

2007.2.23

写于江西师大东区大螺居

目 录

序 /1

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特点管窥 /3

“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

——试论两汉经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远影响 /15

《诗经》情感研究三题 /23

《诗经》忧患情感浅论 /36

《诗经》情感表现中的意念因素探赜 /45

《诗经》情景关系论 /54

“唯乐不可以为伪”

· ——浅析《礼记·乐记》中“乐”的概念及其艺术本质论 /64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试析儒家文质论在《礼记》中的生成 /73

“温柔敦厚”与中和之美

——试析儒家审美原则在《礼记》中的生成 /80

“惟君子为能知乐”

——试论儒家艺术鉴赏理论在《乐记》中的发展 /88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试论屈原的孤独情感 /94

《史记》“互见法”初探 /103

关于司马迁历史散文成就的思考 /114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 /118

错位与“失语”

——经学语境与汉大赋的话语方式 /135

经学衰微与汉赋的文体升华 /148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牡丹亭》“至情”主题的历史文化渊源 /160

王船山美学思想发微

——关于王船山的“接受美学”诗歌理论 /173

超汉越宋 别树一宗

——清代古文研究的几点认识 /181

蒋士铨文学理论与创作论略 /193

道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庄子》道论三题 /215

《庄子》形象系列之我见 /226

《庄子》意象试论 /238

《庄》《韩》文学异同论 /249

“以天合天”与“妙悟”之我见

——中国古代艺术领域直觉思维理论溯源 /260

《淮南子》艺术鉴赏论探赜 /271

亦谈尼采与老庄

——与张世英先生商榷 /279



禅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江西禅宗兴盛与周边文化因缘 /291

“平常心是道”

——江西禅宗佛性论的文化透视 /298

“君臣五位”刍议

——中国古代禅宗政治伦理学说的文化透视 /310

诗风慕禅

——江西宋代诗歌繁荣的禅学因缘 /317

诗法效禅

——江西宋代诗歌创作方法的禅学化走向 /330

诗论通禅

——江西宋代诗论的禅学化走向 /343

张祜禅诗鉴赏五则 /356

后记 /365

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主要特点管窥

中国古代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的瑰宝之一。即便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算起,它至今也走过了 3000 余年的发展历程。由于自身的语言特点和所处的独特文化形态所致,中国古代文学必然会形成一些其他民族文学所没有的独特个性。准确地把握住这种独特个性,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解读、欣赏古代文学作品,而且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鉴于中国古代文学跨越的时空十分巨大,留下的典籍汗牛充栋,文学形式五花八门,文学流派林立,所以要罗列其中所有的特点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一、诗化的文学品格

所谓“诗化的文学品格”,至少包括以下两重含义:一是指诗歌在各种文学样式中始终雄踞霸主地位;二是指诗歌以外的各种文体往往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内在的诗化倾向。

先看前者。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诗歌的霸主地位一直是非常牢固的。尽管各个时代的代表文体有所不同,但诗歌作为主流文学形式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诗经》《楚辞》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灿若繁星的优秀诗人和不可胜数的名篇佳作。特别是唐宋两代,更是诗人辈出,佳作美不胜收。仅《全唐诗》所录诗人就超过 2200 位,诗作 48000 篇,而宋代陆游一个人留下的诗作就逾万首。纵观整个文学史,诗歌创作在



中国古代不仅历史悠久、作品浩繁,而且艺术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地。正因为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人们往往把古代中国视为诗的国度。

再看后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内在的诗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且不说词和散曲这两种文体本身就是由诗演变而成的,它们与诗歌存在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就是小说和戏剧之类的叙事文体,也同样表现出一种自觉的诗化追求。从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六朝时期虽然出现了以《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怪、志人小说,但那还只是小说的雏形,不被世人看重。只有到了诗歌高度发达的唐代,由于受到诗歌艺术的滋润,小说创作才开始有了自觉的艺术追求。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唐传奇的代表作品《长恨歌传》《莺莺传》《柳毅传》《霍小玉传》中,人们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一种浓郁的诗意。宋元以后的话本小说和长篇章回体小说更是深受诗歌的影响。不少话本小说本身就称为“诗话”或“词话”,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秦王词话》等等。至于明清时期出现的长篇章回小说,其借助诗词艺术之处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章回小说不仅篇首、篇末有诗有词,而且正文之中也穿插了不少诗词。章回小说中的诗词不仅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而且使得整个作品充满了诗意而极大地提高了文学品味。

中国古代戏曲的诗化倾向更是显而易见。从本质上看,中国古典戏曲完全可以视为一种诗剧,充满诗情画意的唱词堪称这一艺术样式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元杂剧或明清传奇剧中,引人入胜之处往往是优美典雅的唱词而不是略嫌简单的故事情节。在古典戏曲的代表作中,诸如“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西厢记》)和“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牡丹亭》)之类诗意盎然的唱词俯拾即是。诚如著名文学史家袁行霈先生所言:“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高明、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大



剧作家,哪一位不是才华横溢的诗人?《窦娥冤》《西厢记》《梧桐雨》《汉宫秋》《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著名的剧作,哪一部不是华美的诗篇?”^①

二、强化的政教功能

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发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始终左右着文学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种十分稳定的正统文学观念。至迟在战国时代,正统的文学观念就开始形成。《荀子·儒效》篇中就已经谈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这实际就为正统的文学观念确立了“原道”、“征圣”、“宗经”的理论基调。汉代以后,随着儒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接受,儒家思想更是成为封建社会不可移易的正统观念。与此相对应,以“原道”、“征圣”、“宗经”为核心内容的文学思想经过刘勰《文心雕龙》的系统阐释,也就自然地古代大多数文学家所自觉接受。正是由于受到儒家正统文学观的深刻濡染,所以政治教化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得到了极度强化。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这种强化首先表现在中国古代文人几乎人人都把从政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且不说杜甫这种“入世”情怀十分强烈的诗人一生都在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汲汲奔走,就是像陶渊明之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田园诗人,也终究难以彻底忘怀政治,仍会不自觉地创作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种“怒目金刚”式的作品。

与文人热衷政治相联系,“文以载道”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必须遵循的话语规则。所谓“道”,从学理的层面上看,无非是指以“仁义”为核心的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的着眼点恰恰在于政治教化;所谓“文”,只不过“道”的承载工具或表现方式。两者之间的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第1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关系只能是文以明道,因道及文。对此,韩愈说得十分清楚:“君子居其道,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争臣论》)在这里,“以文明道”被视为一种政治生命的延续。这种文道观的独到之处在于,韩愈给“儒家传统文学观的‘明道’说加入了与当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完全改变了他的前辈们那种空言明道的性质”^①。继韩愈之后,欧阳修、朱熹、直至清代桐城派领袖姚鼐,这些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无不秉承“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姚鼐就明确说过:“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也;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复汪进士辉祖书》)在姚鼐眼中,“文”仍然不过是载“道”的工具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历代正统文学自觉遵循“文以载道”的话语规则,有着十分明确的政治教化价值取向,而且中国历史上那些非正统的文学创作,如小说、戏曲等,也大多极力标榜各自的教化功能。冯梦龙在《喻世明言·序》中就已经表白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泣,可歌可舞。再欲提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可见在冯梦龙看来,小说堪称一种比正统诗文更有效的“载道”工具。至于《长生殿》《桃花扇》,以及蒋士铨等人的作品,更是以戏曲的形式寄寓政治旨意和道德说教,同样可以视为“文以载道”的另一种版本。即便到了近代梁启超等人力倡“小说革命”之际,其着眼点依旧是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曾经坦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

^①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244~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